

百科史学·传记丛书



杜月笙传

上

章君毅 著
陆京士 校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字:01-2010-433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月笙传/章君毅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000-8450-1

I. 杜… II. ①章… III. ①传记—中国—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371 号

策 划 人:郭银星

责任编辑:陆 源

封面设计:罗 洪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88390093

<http://www.ecph.com.cn>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作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80.75 字数:110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00-8450-1

定价:158.00 元(全三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杜月笙（1888～1951），名镛，号月笙，近现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杜月笙少年贫困，为人机灵，四季身着长衫，举止斯文。自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他长期周旋于党政军商和黑白两道之间，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当时名流如章太炎、杨度及大律师秦联奎等都是他的座上客，坊间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帮助蒋介石镇压工人纠察队，诱杀上海工人运动领袖。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曾封他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等诸多虚衔。1929年出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当时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37年抗战开始，杜月笙积极组织劳军活动，为抗敌后援会筹集大量食品、物品。他曾应八路军驻沪代表要求，专程从国外购进1000副防毒面具送给八路军，还曾将军用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迁居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活动。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除掉了伪上海市长大汉奸傅筱庵，威名轰动一时。1940年，杜月笙负责组建“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他实际上由此成为中国帮会的总龙头。其间，震惊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日支密约”事件，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成功策动的。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重整旗鼓。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大势已去，国民党成了社会主导势力，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经过1946年底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的挫折，杜月笙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他只得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新闻等各行业中发展势力，陆续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校董等职务达60多个。

1949年，国民党三大战役失利后，杜月笙反复权衡，既无法留在上海，也不肯随蒋介石退居台湾，最终去了香港。1951年8月，在病榻上备受折磨的杜月笙，散尽钱财，将仅存的10万元现金分遗家属后，离开人世。

这部《杜月笙传》，系上世纪50~70年代港台文坛知名作家章君毅的长篇纪实作品，经过详细采录杜月笙身边门人、亲属、好友等口述的杜月笙生平行迹，多加背景资料的扩展和演绎，几经增删修改，并经口授者们集体讨论、认可而后，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该书出版后，被认为是有关杜月笙其人生平最权威的传记，颇具历史参考价值。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将这部《杜月笙传》列入“百科史学·传记丛书”，意在为中国大陆读者提供一个完整、准确的版本。台湾传记文学版原书共5册，今经重新录排简体字版后，分为3册，每册450页左右，更方便读者阅读。原著作者的反共立场全面影响了其笔下人物和历史事件描述的倾向性，我们在编校过程中以不违背原意为前提，对一些诋毁、攻击性字词和描写作了适当处理。请读者以今天的历史高度，辨别作者立场，客观判断传主的历史功过。

为《杜月笙传》的出版说几句话

刘绍唐

连载《杜月笙传》，是《传记文学》杂志创刊六年来的新尝试。所谓新尝试：

第一，是观念问题。杜月笙先生虽名闻天下，对民国政治有影响、有贡献，但究属黑社会人物起家，借烟赌发迹，受其惠者甚多，受其害者也并非无有，可以说有誉有毁，有恩有怨。若干人士（包括本刊部分同仁）因而有了这样一个人物值不值得写“传”，应不应该写“传”的问题。因为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所谓“正人君子”或“一代完人”才可以“立传”。本刊创刊之初，即曾遭遇过这一类的问题，但我们认为这种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是我国传记文学所以不发达的一块绊脚石。我们的看法，只要有真材实料，肯说老实话，任何人都可以写传。上述错误观念，不但应该纠正，更应进一步去否定它。关于《杜月笙传》，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只要关系人方面能够无保留地提供资料，而在写作上不受到任何干扰，绝对值得写，并且应该写。这也正是我们一向主张为拓宽传记文学领域而努力的夙愿。

第二，是材料的问题。筹写《杜月笙传》，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除了只能凭藉口述资料外，几乎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杜氏自称“朴实无文”，因为他出身寒微而未受教育，终其一生没有信函日记等材料遗留下来。中年以后，虽显赫一时，对民国政治及政治人物有极重要的影响，也主持过许多大企业，但正式史料记载则寥寥无几。这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

是由于杜氏具有谦冲的美德，许多事情由他出面解决，他却不愿别人在事后提起；另一方面，若干人士受杜氏之惠以后，往往有一种极微妙的心理，即在事后多不愿或不敢甚至不屑把自己跟杜氏的关系坦白地说出来。在这种“口说为凭”的情形之下写传记，最容易也最困难。容易者可以说“死无对证”；困难者众说纷纭，各行其是，取舍为艰。

第三，是写作问题。撰写《杜月笙传》虽筹备经年，但连载之初，我们只有全书的一个轮廓、一个简单的写作大纲，并非全书业已写就。每期的稿子都是根据访问笔记及口述录音的整理与反复研究而来。这种写作的方式，在我们创刊以来也是第一次。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本传发表之初以及连载期间，仍不断公开登报征集资料，执笔人与编者随时都在注意各种新发现的资料以及各方的批评与反应。感谢为我们提供文字或口头资料的许多读者，这都是我们原定写作计划以外的收获。现在全传只完成了三分之一，我们愿在此再一次表示公开征集资料与接受批评的诚意。我们愿意这一部传记文学的巨构，是在杜氏至亲好友门生弟子，甚至反对杜氏的人的通力合作之下，完成的集体创作，好替杜氏及历史留下比较可信的记录。

《杜月笙传》在本刊连载以来，获得极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当然要归功于执笔人章君毅先生。君毅做过著名的报纸与杂志的编辑，是出色的小说家兼历史小说家，他写过几部极成功的传记。但他在写《杜月笙传》时的那种任劳任怨、虚怀若谷与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任何成名作家所不能及的。他一向不用助手，独来独往，朋友们经常看到他携带笔记簿和原子笔，手提重达十五斤的录音机，风尘仆仆，挥汗如雨，一天到晚东奔西跑，采访搜集，直到深夜才能开始整理或撰写。因而有人说他是“用跑新闻的方法找材料，以做苦工的气力写传记”，确是他工作情形的最佳写照。

与杜氏往来最密且与杜氏早年亲友也有密切接触的陆京士与万墨林两先生，时常敬佩君毅的“写谁像谁”。写谁像谁，这除了说明君毅的智慧与文学修养以外，也正是代表他所下的苦功夫之深。

《杜月笙传》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与赞赏，对执笔人应该是最大的安慰。但这一写作“工程”尚有一大半还没有完成，希望他能再接再厉，为读者、为历史，完成这一部传记文学的著作。

不可讳言，《杜月笙传》在陆续发表期间，内容方面也引起一些批评与讨论。近一百万字而主要部分系根据口述资料所写成的传记，其中遗漏的、错误的或需要修正的地方原是不可避免的。最难得的是执笔人的态度，他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应无论是善意的或恶意的，他都一一小心求证，反复研判。此次前一部分排印成书时，较在《传记文学》连载时，新写的与改写的地方达数万字之多。极其显而易见的，诸如“黄金荣的出道”、“清洪两帮简史”、“杜月笙与桂生姐之间”、“张啸林的出身和往事”、“黎元洪游沪情形”以及“徐宝山的事迹与被刺”等等章节，读者试与发表时之本刊作一比较，即不难发现。

《杜月笙传》能顺利在《传记文学》杂志连载，以及陆续编印成书，我们要向所有参加口述与提供资料的诸位先生（恕不列举，请参看陆京士先生《写在〈杜月笙传〉之前》一文）表示最大的谢意。特别是陆京士先生，不但一开始即负主要的筹备之责，而且每期付印之前对原稿均细心加以校订，贡献尤多。

最后我们要感谢近代史学者沈云龙教授，在本书付印之前，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将全书中的重要史实，作了一次检查和修订的工作，从而益增加了本书的历史价值。

写在《杜月笙传》之前

陆京士

十五年前的心愿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恒社同人纪念先师杜月笙先生逝世周年，搜集当代名贤鸿文一十五篇，印行《杜月笙先生纪念集初集》。辑印告成，同仁等曾在斯集“编后”，许下心愿：“先师生前交游，遍及海内外，贡献于国家社会者，初非一端。同人纪念计划，原为三大部分：一为纪念集，兹已先出初集，此后将视文稿搜集情况，续出二集三集。二为年谱，以岁月为序，詮次先后，一一记述，但以人手有限，资料不易搜集，深虑仓卒成书，难免舛误，故悬此愿望，期诸异日。三为章回体小说，先生起家寒素，于艰苦中长成，蚤年生活，颇多令人振奋事迹，尤其于社会基层方面，贡献独多。同人为求深入民众，昭垂久远计，拟延揽能文之士，撰述语体文小说一部，公诸当世。深信为期不远，此一计划，必可实现。”

如今岁月匆匆，转瞬即届一九六七年，距先师之遽归道山，忽忽十六年了。而于恒社同人三愿之立，亦已一十五载于兹。当时计划的三个部分：《杜月笙先生纪念集二集》，业于一九五四年八月问世，辑台港两地贤硕彦耆，友好门人华衮之褒、名山之作凡十七篇，附刊先师病逝前后，各地报章记载，舆论一斑，暨举殡安厝纪实，挽词祭文悼章，都二十万言。即《杜月笙先生年谱》，经十余年之

搜罗考校，增补修订，全稿体制灿然大备，去年年底且印就“年谱资料”一种，分致先生各地亲友，门人旧属，请各就所知先生事迹，详予补列。唯以先生生平，延揽能文之士，撰为小说一端，酝酿多时，几经周章，迄至今日，方始略现端倪，且改小说而为传记，乃不得不在全文问世之前，备述经过，有以说明。

首先摘引香港《星岛晚报》，对于为杜月笙先生立传之事，所持的看法与论评。该报有谓：“盖棺论定，杜氏一生的事迹是动人的，如果能有人写下翔实生动的传记，将是近世最可贵的历史性报告文学。可是，写‘行状’写‘墓志铭’的多，能写杜氏传记的人未必有。半世纪来的上海，反映了新旧转型，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力量的滋长与蜕化……这一个万花筒，只有在历史家的显微镜下，才能够看清。杜氏本人始终是站在政治圈子的边缘，他的操守是旧道德的准绳，而他的一生却是大时代大洪炉中的火炼。他的死，也正是这半世纪结束的钟声。”

词简意赅，深入肯綮；这一段文字，可以代表舆论界和一般人士，对于杜月笙先生之共同认识。语多推崇，窃以为也唯有杜先生当之无愧。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杜先生夙疾益厉，病逝香江。他那一篇脍炙人口，腾传一时，被各地报章一再赞扬的遗嘱，开头第一段便坦然的说：“余朴实无文，生平未尝参加实际政治，然区区爱国之怀，不敢后人……”

试将杜先生的遗嘱，参证杜先生的一生事迹，我们可以发现，如杜月笙先生者，不仅是二十世纪初叶与中期，在动荡不安，斗争尖锐的社会暨国家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旷世奇迹，一代人豪；同时，他更是古今中外史乘里极其罕见的一位成功人物。他一生中的每一面，都像时钟的摆锤，从这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所走的轨道，是由起点而至顶点，而在两点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的种种事迹，向为令人兴奋的谈助与新闻资料，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约翰·根瑟（John Gunther），曾经在他的《亚洲内幕》（*Inside Asia*）一书中，形容杜月笙先生是“当代亚洲引人瞩目的猛汉，中国最有趣的人物”。我认为凡是见过、或了解杜月笙先生的人都知道，杜先生的外貌和内心，表里如一的是恂恂儒雅；而所谓“最有趣人物”，似不妨以“最富传奇”的人物代之。

杜月笙先生在遗嘱中自称“朴实无文”；毋庸讳言，他生平最大的遗憾，便是他少年时期因家贫辍学，从此失去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若干年后他奋斗成功，他所拥有的事业机构之一，大达轮船公司有一艘大达轮落成下水，他以董事长之尊，在高冠峨服、衣香鬓影者流的簇拥下，搭专轮去主持典礼，途经杨树浦，他指着岸上的一间礼拜堂，不胜感喟地告诉杨管北先生说：

“那里是我小时候读书的地点，当时一个月学费只要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

像这样一位只读过几个月书的“朴实无文”之人，我们抛开他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影响，以及他个人多方面的事功不谈，即以交游和识见而论，当代可与他相颉颃者恐不为多。骈文巨匠，当过黎元洪总统秘书长的饶汉祥氏，即曾撰赠他一副楹联，而被杜先生悬在他上海华格臬路住宅第一进的大厅，文曰：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杜月笙先生的门下客，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就中他以对待文人墨客、知识分子最为敬重，谦恭和悦，优礼有加。也正由于他的礼谦文士，向来是“一身傲骨，目空四海”的章士钊、洪宪要角“生平愿为帝王师”的杨度，不但能和他倾心结交，尚且乐于为他所用。沪上报人如汪松年、赵君豪、唐世昌、余哲文、姚苏凤、朱

庭筠、张志韩等诸兄，更曾向他敬执弟子之礼。

除了奉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不懈，杜先生直到暮年，一向都请了老师在家，教他读书写字。

他自己励志进修，勤读不辍。但凡遇有重大的问题发生，属于专门范围，而不是他的智识能力所可了解，杜先生会立刻想到某人对于此一问题有所研究，或者某人对此具有实际的经验，他便把某人某人分别找来，为他详细讲授。那时候他聚精会神地听讲，听不懂的地方顿时便问，接连请几位先生讲解下来，于是，他学问也有了，经验也得到，据而处理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他善于吸收学识经验的过人之处。

于焉，方治先生曾谓：“先生尝以幼年未能致力学问为憾，可是他的刻苦自励，慎思明辨的功夫，较之一般自命为通儒学者，并无逊色。盖因天赋甚厚，虚怀若谷，有以致之。他把宇宙间的经纬万象，都作为研究的课题；社会上的美恶是非，都视作人生的明镜。因此，他的卓越见解，超人智慧，诚非常人所可望其项背。”

旨哉斯言，入木三分。由于方治先生这一段月旦之评，使我想起过去有人“封”杜先生为社会学博士。我以为这并不是对杜先生失敬的一种讽刺，而是很允当的称号。故前“行政院长”俞鸿钧先生撰《忆杜月笙先生》一文中便说：“……先生交游遍天下，士农工商各阶层无不普及，故其社会经验，更较任何人丰富。”

杜先生因为自己幼年失学，及长对于文化教育事业，极为重视，他曾斥资数十万元，在上海北新泾创设正始中学，贫家子弟，一律免费。这所中学管教綦严，规模又大，前后若干年间，为国家造就不少人才。北伐时期军政要角陈群，当他宦海失意，潦倒申江的时期，便曾应杜先生的延揽，担任过正始中学的校长。

在文化事业中，杜先生和上海新闻界渊源颇深，早年他便担任申时通信社董事长。抗战胜利以后，他更出任《申报》董事长、《新闻报》董事、《商报》董事长等重要职务。此外，他又曾任世界书局代董事长、大东书局董事长，以及中华书局的董事。如所周知，

申新二报素称国内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报业巨擘，《商报》是后起之秀，但大有后来居上，四方瞩目之概。如世界、如大东、如中华，都是久执文化出版业牛耳的大书局。杜先生遥遥领导，能够做到上下一心，员工翕从。他由只读过几个月书的市井中人，一跃而为文化、教育、新闻界的领袖之士，这份荣耀，岂是轻易得来？汲长补短，徒利自身，而杜先生却能更上层楼，将他平生莫大的遗憾，化为对文化教育服务的热忱，个人不忤不求，但求尽心尽力，兼且一一发乎至诚，难怪他在这一方面，能以一介布衣，系天下之重望，而其一生行谊亦以儒侠相并先了。

不做官、不受公禄

杜先生在他的遗嘱中又说：“……生平未参加实际政治，然区区爱国之怀，不敢后人……”

诚然，这是纪实之句。终先生一生，从未担任过政府的公职，接受过国家的俸禄，然而望重东南的广泛人缘，爱国的一腔衷诚，前后四十年间，论一介平民而为党国所尽力量之大之多，恐怕也是无人可与杜先生比拟。举其荦荦著者：蚤在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兴，总统蒋公挥戈北向，先生便联络志友，秘密响应。十六年竭力游说奉系军阀毕庶澄，放弃淞沪，同时并组设共进会，协助革命，参加清党。祝绍周先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参谋长，以当时驻沪深受先生之助，曾经撰文盛予颂扬：“杜先生朝夕参与筹划，竟无倦容，新工人纠察队，多其从者，出力尤大。先生在沪，仅一介平民已耳！无官守，无职责，而独忠诚爱国如是，当亦天性忠义所使然也。”

由于这惊天动地的一幕，杜先生厥功至伟，蒋总司令亲自延见，请他担任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先生表示仅能接受名义。那年他正四十岁，春秋鼎盛，意兴颇豪，曾经穿起少将军服，拍了一帧照片。自此以后便不闻他再提起这事，此为先生穿军服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清党以后，杜先生声誉鹊起，成为举国闻名的大人物。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孤军抗敌，先生筹款十万汇往慰劳。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沦为战场，先生筹组地方维持会，供应军需，抚辑流亡，开军民合作，共御强侮之先河。二十六年抗日军兴，先生成立抗敌后援会、江浙行动总队，发动全民，支援前线，筹募救国公债，数逾七千五百余万元。上海沦陷，日阀百计笼络羁縻，杜先生大义凛然，轻装简从，偕钱永铭先生乘外轮赴港。自此协助中枢，策动沪上地下工作，功勋卓著，昭昭在人耳目。如锄奸肃谍，搜集情报，汪精卫觐颜事故，轰动全球之高陶反正事件，即由先生幕后策划，一力促成。

抗战中期，杜先生移居重庆，仆仆风尘于西北西南道上，全力协助中央政府稳定金融、建立工业、搜集物资，供中枢平准之需，对于八年抗战，实有莫大之贡献。卅三年盟邦并肩作战，先生更奉枢府邀赴浙江淳安，策应盟军登陆。

胜利后，先生还居上海，由于国家社会对他的倚畀更殷，当时所拥有的头衔，除了本文第一节所列文化教育界外，真是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兹予记略如下：国民大会代表（一度当选主席团）、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为了表示谦冲自抑，曾坚辞议长一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全国轮船业总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总会理事长、上海市商会监事、上海市工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上海市水果业公会理事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理事长。工商业界，他更以上海领导阶层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维持其不作第二人想的崇高地位，他是荣丰、大丰、恒大、沙市、中国纺织等各大纱厂的董事长，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汇、浦东、国信等银行董事长，上海南市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民丰、华丰两造纸公司董事长，华丰面粉厂董事长，上海鱼市场理事长，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招商局、复兴轮船公司常务理事，大通、大达、裕中轮船公司董事长，中华、通济、嘉陵、扬子等贸易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暨西北

毛纺织厂董事长。

以上所列一连串重要而显赫的职位，多一半是杜先生私人拥有的事业，一部分是他膺选担任的民意代表职务，另部分则于公私合营机构，由他出面代表国家或官方的资本，其余的是有因特殊情形，而由党政双方认为他是适宜人选，加以聘任。在林林总总这许多要职之中，我们不难发现，杜先生对于他不做官、不受公禄的原则，始终兢兢自守，一成不变，纵使他一生与党政首要联系极多，关系密切，然而，在他六十四年的生命史上，他永远保持做一位中国一品大百姓。钱永铭先生撰《杜先生传》，赞曰：“洪范五福，厥难考令终，先生自称出身寒微，朴质无文，乃其树立之伟，涵照之广，征诸近世，无与抗衡，即战国四君，朱家、郭解，亦难并拟。先生起布衣，无尺寸之藉，而其功绩，炳若日星，敝屣名爵，孜孜为善，惟恐弗及，被其泽者，不知凡几。举国上下，咸尊曰杜先生而不名。于戏，可尚也已！”

诚然，钱先生的赞颂，堪称对杜先生的月旦之评，公正允当，并无一字词费。而“杜先生”这个称号，风行大江南北，以及西南东北西北边陲，人人尊称杜先生而不名。杜先生三个字，竟比那些十张名片都印不完的头衔，弥足珍贵多矣。

义粟仁浆施于四海

杜月笙先生遗嘱又有云：“……诚以余出身寒微，所受国家社会之恩赐殊多，义之所在，不敢不尽力以赴之也。”

先生在世，无论在任何场合，在任何人面前，向不讳言他“出身寒微”。这是他朴质谦抑，和易近人，而且真诚坦白，胸无城府处。杜先生的童年，不仅对他个人，是一页血泪辛酸史，即令于他的家族，也有不尽的痛苦与悲惨。杜先生诞生于逊清光绪十四年，民前二十四年，时值清廷积弱，外侮日亟，欧西各国势力，相继侵入淞沪，上海若干农工商小市民阶级，环境日蹙，生计艰难。杜先生降临人间，他的尊翁文卿公正设米肆于上海杨树浦，越一年，母

氏朱太夫人带他由浦东高桥杜家花园旧宅，迁赴杨树浦依文卿公同住。又一年朱太夫人诞一女，产后即告病逝，以致杜先生不仅在襁褓中痛失慈母，而且连他那位等于从未谋面的胞妹，也因家运的蹇滞，送给一位黄姓的宁波人，作为螟蛉。

先生四岁，所幸文卿公续弦张氏夫人，对先生视同己出，备予钟爱。然而好景不常，五岁时文卿公病歿，张氏夫人抚育遗孤，撑门立户。又过了两年，米店因经营不善，被迫歇业。张氏夫人只好携同先生，遄返高桥，勉力维持生活。不及一载，衣食两缺，母子二人实在撑不下去，张氏夫人被迫脱离杜氏门庭，留下先生这个八岁大的孤儿，茫茫人海，茕独无依。幸有他的外祖母朱太夫人予以收容，但是外家的生活清苦，先生不愿闲居坐食，因此一应成人的操作，亦往往挺身任之。到十五岁那年，他一肩行李，两手空空，和外祖母在八字桥畔对泣而别，孑然一身，到华洋杂处的十里洋场，去求生存，打天下。

在这样穷苦困厄的环境之中，杜先生的父母双亲相继病故，家贫以至无力营葬，两口灵柩，先后停在杜家花园宅外的田塍上，仅于灵柩上面覆盖一些稻草，聊蔽风雨。荒丘暴露，为人子者情何以堪？但是家境如此，椎心刺骨，徒呼奈何。

杜先生是从孤寒艰困中挣扎奋斗出来的，因此他极其了解民间疾苦，人生劫难。他从小时候起便已立下誓愿，博施济众，他曾慨然的说：

“将来杜某人有了钱，但凡遇到穷人，我都要加以接济！”

这句话，杜先生确能终身奉行不渝。从民国七年起，夏施痧药，冬赈寒衣，死赠棺衾，年节送现钱，他对浦东故乡数以千计的贫弱病苦，一直照拂济助到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事变为止。而平时任何人倘有缓急相求，不论数额大小，他无不欣然应命。战前每月拿着专折，到杜公馆支领生活费的，多达二百余户。自民国二十四年迄二十六年，短短三年之间，他个人捐输的各项义款，为数即达一百五十万元之巨。至于民国十六年北伐之役，十七年陕北旱灾，二十

年长江大水灾，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几度大难，庐舍为墟，灾黎遍野，流离失所，都曾由杜先生登高一呼，国人景从，于是广施赈济，全活无算。以是杜先生逝世后，张岳军先生挽词中有：“卜氏输财，历济艰危昭史乘”之句，而王正廷先生亦曾挽以：“是大众卫星，义粟仁浆施四海！”

先生早岁饱受贫穷的苦楚，待他成功发迹以后，他仍自奉俭约，不尚奢靡。他在饮食方面毫不讲究，山珍海味，固所不辞，一碗咸泡饭，也能吃得津津有味。衣着一道，他更是常年一袭长衫，怡然自然。

仁民爱物，薄己厚人，这是杜先生立身处世的一大原则，且能身体力行，历数十年而不渝。香港《时报》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九日的一篇社评，对于杜先生的此一美德，论说得相当透彻：“杜氏以一‘出身寒微’，‘朴实无文’的平民，崛起海隅……平日立身行己，对人接物，尚道义，重然诺，处处揭示着‘朴质无文’的本性，即处处表现着令人尊爱的美德。因此，他能以布衣而抗颜当代名公巨卿，广交四方智勇力辩之士，无贵贱，无贫富，皆乐与接近。他又能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忍人之所不能忍，救人之所不可救。故其事业的发扬大成，固由于他的才智使然，而社会大众在无形中给予他的同情鼓励，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果实的获致，即是从他一生的义行中产造出来的。”

友天下士 读古人书

提到杜月笙先生的才智，以笔者和他过从二十余年，情深肺腑，谊重骨肉，朝夕亲炙教益，长年累月所获致的印象而言，我必须承认，杜先生纵或只读过几个月的书，“朴质无文”，然而他慎思明辨，目光如炬，他的才智多半是由天赋而来，亦即钱永铭先生所说的：“智慧天纵，仁心夙具。”除此而外，那便是他天性“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国之大老许世英先生，和杜先生订交二十余载，屡共寓庐，常同晨昏，许先生尝留心观察杜先生怎样治乱理棼，待

人接物。许先生说：“观其治事，恒若不假思索，而无巨细，罔不衷于至当。其交游也，事上无谄，遇下有恩，富贵贫贱，死生不易，其态纯然，如浑金太璞，不待雕饰而成大器！”吴铁城先生也曾说过：“……先生，昭代超人之一，重言之，一非常人也。先生独有其至性至德，良知良能，得天者厚，与生俱来，发为行动，均合于造化之自然，有若春风之煦育，甘露之膏泽，滋荣万物，造福群生。”方治先生尤曰：“先生尝以幼年未能致力学问为憾，但是他的刻苦自励，慎思明辨的功夫，较之一般自命为通儒学者，并无逊色，盖因天赋甚厚，虚怀若谷有以致之。他把宇宙的经纬万象，都作为研究的课题，社会上的是非美恶，都视作人生的明镜。因此，他的卓越见解，超人智慧，诚非常人所可望其项背。”

综合以上三位先生的高论，加上笔者个人对于杜先生的了解，杜先生之所以崛起沪滨，领导群伦，浸假成为一代贤豪，其基于个人才智方面的因素，我以为似可归纳四点：一是天分智慧绝高，二是魄力雄浑，三是虚怀若谷，对人从无骄矜之态，成就愈大，愈发谦虚。“满招损，谦受益”，就杜先生而言，确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四是杜先生还有一项异于常人的最大优点，便是“知人善任”。

杜先生一生严格遵守他个人所创的许多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知人、善任”，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处理人事问题，从不假手他人。

以我个人亲身体验所得，杜先生用人的方法，非常巧妙。我们不必讳言，杜先生的门下三千客，良莠不齐，鱼龙曼衍。但是杜先生用人的第一步先是知人，他以一双慧眼，丰富的阅历和过人的社会经验，门下客有什么长处，什么短处，他可以在短暂时间之内，洞悉无遗。然后，他便取其所长，截其所短，使每一个人都能置身发挥长处的工作岗位。

杜先生品评天下人才，列为四等。有本领而无脾气者居上，有本领也有脾气者列中，无本领亦无脾气者下焉之，无本领反有脾气者不入流，属于劣等。他所谓的本领，不一定是精娴韬略如诸葛亮，或则